# 現代性演化中的西方「文化革命」

利力服

1960年代末,社會主義中國和資本主義歐美中的激進知識人一起造反資本主義,實為二十世紀社會文化現象的一大奇觀。

在「文革」時期,某些歐美國家中的一些激進知識人禮讚中國紅衞兵行動, 期望把毛澤東主義傳播到歐美土壤①;「文革」後時期,某些中國知識人又受到 歐美變革知識論述激發,期望把種種人文—社會理論的變革論述傳播到中國。 據説,從歐美「文革」精神中發展出的種種人文—社會理論新論述,使長期蔽而 不明的中國「文革」的現代性意義豁然明朗②。

兩種「文革」確有某些共同的理念和社會行為特徵,例如:造反資本主義制度結構,主張群眾民主,踐行大眾藝術化的革命行為。可是,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結構、社會文化資源均不同,要持論兩種「文化革命」造反的是同一性質的官僚制度,推動的是同一性質的群眾民主,踐行的是同一性質的大眾藝術化革命行為,恐失之輕率。兩種「文化革命」的親和性論證的要旨在如下論點:兩種「文革」均在屬己的現代社會演化進程中挑戰資本主義的現代性構想及其歷史樣態,開放了另一種現代性的理想空間。於是,「文革」事件被放到現代性轉換(或後「現代」)的思想空間來看待,重新勘定其「深遠的歷史意義」③。

現代性提案。

## 一文革釋義的兩種立場

從現代性問題角度探析「文化革命」,確是富有激發性的。不過,這一取向本身就相當歧義,不同的現代性理論立場會給出不同的「文化革命」釋義。雖然有簡單化之嫌,為簡明起見,我仍然用變革和解釋來歸納兩種基本的「文革」釋義立場。馬克思説,哲學家(如今可更換為社會理論家或文化理論家)的職份不在於解釋世界,而在於改變世界。事實上,當今社會理論仍不外變革和解釋這

兩種基本的論述態度。基於變革的現代性理論立場,論者可以從「文化革命」的理念和實踐中讀解出諸多肯定性的、超歷史事件本身局限的意義蘊含,「文革」理念的歷史意義不受「文革」的歷史實踐失敗(是否「失敗」亦值置疑)的影響,相反,在當今時代,至少值得捍衞和發展「文革」理念;基於解釋的現代性理論立場,論者會對「文化革命」的理念和實踐持審慎的觀察態度,從「文化革命」的解讀中積累認識社會失序的歷史知識,為現代性的演化(而非另一種現代性的創造)尋找引證。

「文化革命」是現代性現象,西方某些論者把「文化革命」之源上溯到列寧領導的與資本主義爭奪文化霸權的俄國革命。在我看來,如果「文化革命」的基本含義是群眾民主的革命運動④,那麼把法國大革命視為現代性的「文化革命」的第一場演示,似乎更為恰切。法國大革命之後,即出現解釋(柏克、托克維爾、布克哈特)和變革的「革命」後論述,由此引發的激烈的現代性論爭,迄今尚未緩解(盧梭的紅白臉譜之爭即是例證)。若干年後,1966年5月16日是否會成為一個法定慶典日,以誌新的(或另一個)現代性的劃時代開端,尚未可知。可知的是,60年代末的「文化革命」釋義的歧義性論爭會持續擴展,法國大革命釋義論爭的基本思想格局,在當今的「文化革命」釋義論爭中不是已然再現了麼?

無論文革釋義如何歧義爭紛,對文革的歷史社會學、政治學研究,仍然是各種釋義賴以成立的基礎。因而,從比較歷史社會學角度參照研究60年代末的兩種「文革」,是推進「文革」研究的重要進路之一。目前的「文革」研究顯得不平衡:漢語學者對中國「文革」的實證性研究積累不多,理論闡釋寥寥無幾。不平衡的情形更在於,漢語學界對歐美「文革」缺乏實證研究和理論闡釋。既然「文革」研究背後沉澱着現代性重建這一大題目,漢語學界就當在拓展中國「文革」研究的同時,開發歐美「文革」的研究題域。否則,漢語學界不可能具有足夠的學理資源,去考量某些歐美學者基於兩個「文化革命」提出的重建現代性提案。

## 二文革與兩個世界體系

60年代末的「文化革命」,是社會主義世界體系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部近半個世紀的現代演化的結果。從1918年的俄國革命和德國革命,到1966年的中國紅衞兵造反運動和1968年的法國學生造反運動,表明了兩個世界體系在現代性建構過程中的雙重偶在性:一方面是各體系內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的偶在性,另一方面是現代性建構的正當性選擇上的偶在性。社會主義世界體系內部發生的「文化革命」,在理念上的正當性基點是,替代最終會衰亡的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一場「文化的」革命,意味着實現更為正當的現代性。儘管反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革命提案,既有民族國家自身的偶在動因(反美反蘇),又有現代性選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偶在動因,兩者的關係相當曖

昧,反既是一種現代性方案又是西方強權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畢竟是這個革命的理想目標。

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動員針對自身的反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預設了這個制度結構中存在着資本主義因素殘餘。無論這個革命理據如何似是而非,它是中國「文化革命」的正當性理據。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的某些「文革」理論家在論證「文化革命」的正當性時,試圖避免這種似是而非。巴羅(Rudolf Baro)論證説:「文化革命」承擔了共產主義的許諾,即從根本上解除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基本痼疾,消除現代人類的對抗狀態,走向普遍解放⑤。但在社會主義制度中進行「文化革命」,革命的目標應該是現存的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查看這個新制度是否在逐漸兑現其現代性許諾,如果沒有,它就成為革命的對象。按照這一論點,社會主義制度中的「文化革命」應是革社會主義制度自身之命,若以資本主義為對象,無異於設定了一個假想敵。

在這位東德馬克思主義者的「文革」理論中,革命方式被設計為,「將群眾引向文化革命、在不斷擴大的行動中實現多數人一致」,以便革命行動日益深入到現代性的基本矛盾中去⑥。群眾民主是「文化革命」的直接目的,實現這一目的的障礙,是社會主義官僚制,而不是資產階級法權。按「多數人」的術辭來看,社會主義制度中的「文化革命」推崇的群眾民主,仍然是盧梭式的「人民民主」理想。群眾是誰?是多數人,還是每一個人?是意識形態化的群眾,還是個體自由的群眾?其差異非同小可。

歐美資本主義制度中的「文化革命」同樣是一場現代性的檢省運動,審察資本主義的現代性許諾是否兑現,它既沒有把社會主義作為假想敵,亦沒有許諾要通過「文化革命」實現社會主義,倒是要實現「真正的」資本主義。

歐美學界研究西方「文革」的論著已不勝枚舉,但研究路數大致不外兩種:或歷史社會學、政治學的描述分析,或文化理論的景觀式分析。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弗拉克斯 (R. Fracks) 曾是60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活躍份子,擔任過「爭取民主學生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幹事,他以親身經歷撰述的《青年與社會變遷》就屬前一類⑦。孔狄利斯 (Panojotis Kondylis) 的《市民思想和生活形式的衰落:自由的現代與群眾民主的後現代》不注重作為歷史事件的西方「文革」的描述分析 (講故事),而是盯住「文化革命」與現代性重建的關係這一決定性問題,討論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轉換關係,把「文化革命」看作這一轉換中的重要環節,為考察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現代性重建提供了一個審視點。

當今某些中西論者從現代性與「後現代性」(或另一種現代性)的變革論來闡釋毛主義的「文革」理念,為檢審這種論述是否有效,了解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文化革命」的性質是必要的,因此值得考究三個問題: (1)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究竟有怎樣的關係; (2)「文革」在這種關係轉換中的實際形態如何; (3)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文化革命」的性質是甚麼。

在社會主義制度中進行「文化革命」,革命上現在 中華 市 的 目標應該是現存 中 重 看 這個新制度本身 看 這個新則現現 明 是代 中 医 一 在 逐 漸 兑 現 果 沒 有 史 不 在 性 它 。

### 三 文革與所謂「後現代 |

按孔狄利斯的論點,現代性和後現代性概念的含混,主要緣於未能區分這兩個概念具有的雙重用法。現代性概念的兩層含義是: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30、40年代的文藝現象,和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的社會政治現象;與此相應,後現代性的雙重含義是: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文藝潮動,欲革去文藝的現代性形式、內涵和立場的命;另一用法指同一時期出現的思想脈動,挑戰啟蒙理性的普遍性和全權性,宣稱自由主義的啟蒙現代性提案已失效,倡議另一種現代性:群眾個體生活的自由遊戲和多元社會的多權力和多意見中心®。

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文學現代性形成之時,亦是工業化群眾社會形成之時,它威脅到古典自由主義的訴求和社會治權。古典自由主義的具體歷史含義是資產者的社會—政治優勢 (Dominanz des Bürgertums),工業化群眾社會中興起的群眾組織和群眾運動縮小了資產者寡頭政治的政治空間,引起資產者的抵抗,竭力使自由主義的制度安排不再向群眾民主方向移動。結果,群眾社會雖然出現了,但卻沒有出現群眾民主政制。群眾社會與資產者寡頭政治的衝突膠着於是否實現群眾民主政制。

這一矛盾的歷史解決是從兩個方面來實現的:一方面,本質上屬於古典自由主義的現代資產者寡頭政治被日益擴大的中產階級的社會作用削弱;另一方面,隨着大眾化生產的上升,逐漸形成大眾化消費生活結構。大眾化生產和大眾化消費生活,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一個十年間在西方技術化工業國中出現的新的社會現實。孔狄利斯稱此為工業化群眾社會的第二個歷史階段,後現代性提案是這一階段的產物。表面上看,文學的後現代敍述拋棄了文學的現代性敍述,但從社會學上看,文學現代性與文學後現代性正好對應於群眾社會的兩個發展階段,從實質上說,仍保持了連續性。啟蒙自由主義的現代性論述與自由的社會民主的後現代性論述的對立情形,同樣如此⑨。後現代的社會和思想處境因此是:群眾社會已進一步成熟,群眾民主的實現是否還會像群眾社會的第一階段那樣受到阻礙。

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關係因此可以界定為,作為資產者的現代性之政治法權和世界觀的自由主義與群眾社會的社會民主主義訴求的又一輪衝突,文革就是這輪衝突的集中表現。在思想上,這種衝突體現為兩種思想文化形態的對立:自由主義現代性的思想形態的特徵是綜合—和諧,與此相對立的群眾民主的思想形態的特徵是解析—併合。前者致力從不同事物的多樣性中建構統一的世界圖像,後者拒絕認可實體性的、穩固的事物,只有要素和原子,它們的功能作用只是不斷併合新的組合。

## 四 知識青年的造反

知青造反和知青下鄉是中國文革的重要篇章,歐美「文化革命」亦由知識青年來進一步推進群眾民主的訴求,即要求徹底革掉資產者時代社會化的、意識

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 關係可以界定為,作 為資產者的現代性的 政治法權和世界觀 自由主義與群眾社會 的社會民主主義, 文 就是 這輪衝突的集中 表現。

形態的和心理的殘餘。究竟何謂「群眾民主」?經歷過中國「文革」的漢語學者至少知道這一術詞的中國文革式含義。依據這一含義去理解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中的「群眾民主」訴求,恐怕會弄錯。通過察看西方知青的政治訴求,可以看清何謂資本主義制度中的群眾民主。

分析「文革」,只注意那些革命性標語口號的字面涵義,是不得要領的。應該分辨這些革命口號在具體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語境中的特定意涵和客觀效力。 西方知青針對精英統治提出的革命性口號,確是「群眾民主」衝動的真實反映, 這種衝動的實質恰恰是中國「文革」的主要革命對象之一:個人享樂主義的生活 觀。從奇裝異服、打破規矩、上下班時間自由到反官僚制,無一不是為了作為個人的群眾獲得享受自己自然生命的權利⑩。

反資產者的生活習性和生活制度是西方「文化革命」的基本特徵,這與先鋒派藝術的反現代藝術傳統相呼應。「文化革命」的主要擔綱者出自對資產者的生活倫理和工作習性極端反感的新興群眾,他們蔑視資產者的生活秩序觀,尋求實現自己的生活價值觀。這種「革命」群眾的性質新在何處?新在他們是擁有技術知識的群眾,不再是工業社會時代只能出售勞力和簡單技能的群眾。在工業化群眾社會的戰後發展中,經濟管理機構和消費性生產制度的擴展,使運用技術知識的功能有了很大變化,工作技術化和組織化的迅速提高,知識青年的身分地位和社會分布大為改觀。服務行業和大眾傳媒的擴大,亦使知識青年的身價大升。可以說,工業化社會向技術化社會的轉化,應用知識人激增,他們的職業和社會地位亦隨之上升,其生活觀開始要求支配社會的意識構成。這就是杜拉克(Peter Drucker)所謂「後資本主義」的知識生產和分配的重組,技術知識日益成為重要的經濟資本,而這種資本是可由個體知識人隨身攜帶的⑩。基於這樣的經濟資本,青年知識人就要求政治資本,要求實現自己的生活價值觀。

技術化知識社會的出現,伴隨着教育制度的擴展,應用知識學科的擴建和招生人數的擴大,使青少年更早脱離家庭的監護懷抱,進入大學生群體,以致於大學(含技術專科學校的學生)成為技術知識人群眾社會的熔爐。弗拉克斯在分析青年學生的反叛行為的性質時認為:「文革」是社會文化轉變的基本症候,它反映了正在崛起的科技潛力與現存社會秩序和文化體系之間的基本衝突,要求建立新的價值、新的動力機制、新的權利和新的制度。科技化社會變遷產生了新的社會角色——新的階層(知青),其成員懷着對舊規範及固有結構的不滿情緒②。由此可以見出,資本主義現代性演化孕育出的知識青年,與社會主義現代性培育出的知識青年的品質截然不同。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中,亦出現了技術知識群眾階層,然而,有兩個因素限制了這個階層形成自己的政治訴求。首先是由於消費性生產以及技術化程度不高;更主要的是,政黨國家的新興技術知識人受政黨意識形態支配③。一旦政黨意識形態魔咒脱魅,才會出現個人主義的知識人群眾的「文化革命」訴求,例如,這種「文化革命」只有在中國的「文化革命」後時期才可能發生。

這一切都是在60年代開始出現的,「大批生產、大批消費、群體教育、群體傳播」,以及「服務於它們的學校、公司和政黨等專業性制度」 @是西方「文化革命」的社會基礎。新型的群眾對民主的要求不同於早期群眾社會,技術知識青年的群眾民主訴求首先指向生活風格的自決權。資產者「老爺」們給他們冠以「垮掉的一代」的稱號,正表明他們與資產者的生命觀念和風格絕不相容。踐行性自由、吸毒、暴力,不過是新型知識青年創造自己的自由生活經驗,突破資產者生活規範的非常手段。資產者「老爺」們在歷史中曾對封建貴族的生活風格和價值觀施以革命之術。如今,出現了新型的知識資產階級,他們不是少數企業主、大貿易商,而是眾多掌握實用技術知識的青年群眾。現在輪到他們對資產者權貴的生活風格和價值觀施行革命之術了。

### 五 西方文革的動機結構

從這一意義上説,西方「文革」實質上是一場新興技術知識資產階級的革 命,這種知識資產階級是以大批量形式產生出來的,但他們的價值觀是相當個 體主義的,所以,西方知青的造反並非一場中國文革的高度政黨意識形態化的 動員式社會運動。不同國家的制度結構差異亦使西方「文化革命」在意識層面和 社會層面的內在差異十分明顯。不過,在孔狄利斯看來,西方「文化革命」 仍有一個共同的大目標,即要實現「反結構」或「零度結構」(Antistruktur oder Nullstruktur)。「結構」指現代資產者階層在近百年逐漸制度化的自由主義價值觀 念和秩序規範,在價值觀、生活趣味乃至社會身分等方面,這種「結構」仍是一 種人和價值的層級秩序(Hierarchisierung)。「反結構」或「零度結構」意味着應該 拆除這種層級秩序,創造個體自決的群體生活的自由形式,這些形式從政治組 織、文化組織、工作群組、兩性生活或居住群體到某個短時的群體組合(如一場 搖滾音樂會),無所不包,總之是自由、隨意的結合,不分職業、身分、性別, 純粹是個人的自由參與行動。價值觀自決的個人通過自由創造的生活形式(而非 被老資產者的生活觀安排好的秩序結構) 找到自己的身分,這預設了生存價值觀 的絕對平等和無差異。「反結構」的「文化革命」固然需要某個領袖的帶領,需要 對某個明星的崇拜,但拆除「舊結構」既然是絕對自由的個人實現自我的前提, 「革命 | 領袖或被崇拜的明星都是曇花一現的,不可能有持久穩固的權力基礎。 結構意味着界限和限制,「反結構」或「零度結構」就意味着創造一個自由空間, 以便讓個人的自發性和潛力充分發揮⑮。

「反結構」的「文化革命」形式尤其表現在身體行動方面:從搖滾樂、同居、同性戀、一夜情到迪士科提供了實現價值觀自決的多樣形式,讓知識人群眾抖掉一切束縛,表達反抗或達到鬆弛。以青年文化為主要形式的「文化革命」是狄奧尼蘇斯式的酒神精神,它造反「資產者的阿波羅精神」(bürgerlichen Apollinischen),因而帶有審美化的性質。西方文革的理論之父馬爾庫塞

「反結構」的「文化革 命|形式尤其表現在 身體行動方面:從搖 滾樂、同居、同性 戀、一夜情到迪士科 提供了實現價值觀自 決的多樣形式,讓知 識人群眾抖掉一切束 縛,表達反抗或達到 鬆弛。以青年文化為 主要形式的「文化革 命」是狄奧尼蘇斯式 的酒神精神,它造反 「資產者的阿波羅精 神」,因而帶有審美 化的性質。

(Herbert Marcuse) 曾論證革命應深入到生理層面,要求「自然的解放」和「自然的激進變化」⑩。這裏的自然主要指生理的自然。身體造反運動的高潮表現為對暴力和性的態度,兩者均被視為個體人身自發性和自由潛能的展示,戰勝資產者生活秩序束縛的表現,生命精力的證明。西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崇拜有時也與政治靈感的恐怖行動相關,而且運用暴力的正當性理據並不需要太多,只需視為生存上的突破即可,甚至只為了宣泄一下也行。可以看出,西方「文化革命」的動機結構是個體人身的自然本性的釋放,這是技術知識人群眾的基本革命性訴求。

「文化革命」以後,對性自由的神化才開始社會化,在此之前,性自由還只在先鋒文藝中得到頌揚。性自由被視為個人的自我發現和自我實現以及個體化溝通最卓越的領域,在充分展開自己身體潛能和衝動性的同時,資產者意識形態的自我克制倫理和理性人類學被狠狠嘲弄一番。中西方的「文革」雖然均有「反結構」的性質,但「反結構」的動機因素以及所反的制度「結構」,都是不同的。

### 六 文革是一場革命嗎?

西方「文化革命」是一場革命嗎?如果「革命」應明確地理解為以一種社會形式或統治形式取代另一種社會形式或統治形式的政治行動,或按馬爾庫塞的說法,「是一個社會階級或社會運動,它以改變社會政治結構為目的而推翻一個合法地建立起來的政府與制度」⑩,那麼,西方60至70年代的「文化革命」就不是一場革命,而是孔狄利斯所謂的「走向成熟的群眾民主的適應運動」,它並沒有觸動既定社會制度的政治和經濟基礎,沒有觸動其「生產關係」。早期工業化群眾社會已對老資產者的價值觀、行為規範提出異議,成熟期的知識資產者的群眾社會運動不過是消除其殘餘。技術化的大眾生產和大眾消費生活,決定了西方「文化革命」的實質乃是以知識資產階級的群眾性消費和享樂為基本訴求的群眾民主運動。民主是可以消費、應該消費的價值觀自決的群眾民主,群眾通過應用技術知識在經濟資本的佔有方面大有長進了,如今需要攫取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對於中國「文革」的性質,恐怕也值得問:中國「文革」是一場革命麼?它觸動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礎嗎?觸動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嗎?中國的「文化革命」究竟是開放了新的現代性方案,抑或不過是社會主義現代性演化過程中的一個症候呢?

某些古典社會思想家(舍勒、曼海姆)曾提出如下論點:現代性即群眾造反 資產者®。按此論點,後現代不過是這場造反的推進或完成。在現代化過程中, 資產者通過工業化製造了群眾,隨後,群眾起來造反資產者。「後現代」倒像在 實現馬克思的理想,他設計的共產主義社會不就以自由勞動和自由生存為基本 形式,讓人的所有潛能(當然包括性潛能)發揮出來麼?

但西方「文革」與中國「文革」並無異曲同工之妙,兩種群眾的性質不同,群

眾社會的制度基礎不同,基於不同的群眾品質的群眾民主訴求亦不同。這些可歸結為,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的基礎不同。1969年曾發表《斷絕的年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一書的杜拉克提出過這樣一個論點:社會主義現代性負擔着盧梭和馬克思企望的善的一致和諧的社會救贖承諾⑩。西方文革拋棄了這種現世宗教的承諾,而中國的文革至少在理念上肩負着這種解救社會的現世宗教使命。由此來看,兩種「文化革命」的變革論釋義企求尋找兩種「文革」的參證關聯,是相當渺茫的。

註釋

- ① 參 F. Schneider (Hrsg.): *Dienstjubilaum einer Revolte: "1968" und 25 Jahre* (München, 1992), S. 80-96:加斯托:〈毛主義與法國知識份子〉,《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年8月號,頁15-26。
- ② 參崔之元:〈毛澤東「文革」理論的得失與「現代性」的重建〉,《香港社會科學學報》,7(1996),頁60-74:張宇燕:〈奧文森和他的集體行動理論〉,見王焱、劉軍寧編:《公共論叢:市場邏輯與國家觀念》(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175。
- ③ 參德利克(A. Dirlik):〈從歷史角度看「文革」的政治意義〉,見《香港社會科學學報》,7(1996),頁43。
- ④ 魯德(George Rudén):《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 高毅:《法蘭西風格:大革命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 ⑤⑥ 參巴羅(Rudolf Baro)著,嚴濤譯:《抉擇:對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批判》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211以下;311以下。
- ② 弗拉克斯(R. Fracks)著,李青、何非魯譯:《青年與社會變遷》(北京:北京 日報出版社,1989)。
- ®®® Panojotis Kondylis:《市民思想和生活形式的衰落:自由的現代與群眾民主的後現代》(Acta humaniora, 1991),頁9:12以下:232。
- ⑩ 參 S.M. Lipset著,張華青等譯:《一致與衝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頁273。
- ①⑨ 參杜拉克 (Peter Drucker),傅振焜譯:《後資本主義社會》(台北:時報文化 出版公司,1994),頁11-15;17-19。
- ⑩ 見註⑦ R. Fracks, 頁6;亦參註® P. Kondylis, 頁230。
- ⑤ 参別洛策爾科夫斯基著,林英譯:《自由、權力和所有權》(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頁36-43。
- ❷ 参Alvin Toffler & Heidi Toffler著,陳峰譯:《創造一個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上海:三聯書店,1996)),頁23以下;14。
- ® 參H. Marcuse: *Über Befreiung* (Frankfurt / Main, 1982) ,第二章:馬爾庫塞等著,任立譯:《工業社會與左派》(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頁129以下。
- 動馬爾庫塞:〈倫理與革命〉,見江天驥主編:《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的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124。
- ® 參舍勒 (M. Scheler) 著,羅悌倫譯:《資本主義的未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曼海姆 (Karl Mannheim) 著,劉凝譯:《變革時代的人與社會》(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

**劉小楓** 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員 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學術總監